

五教授上书中央直陈新农村之困

最高层两次批示要求给予高度重视

核心提示

在新农村建设这部事关中国前途的历史剧中,随着剧情的深入,近半个中国启动了新型合作医疗、4800万名西部中小学生开始享受免费教育、2006年一年中国农民每人腰包多了300块钱、沿海城市打造了一个个高档的试点新村。

在八面风光之下,5位大学教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这部历史剧当之无愧的主角——中国9亿农民,还没有入戏,他们还不能适应帮助他们发家致富的种种政策,而那些已经入戏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农民兄弟究竟需要什么。

剧情的发展由三股力量推动,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;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、培训农民等项目;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。

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,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。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不具体路径选择上,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同步进行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。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——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、贫民窟。

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。比如,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,应该发展“村容整洁”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、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。

中国农大5位教授的发现

今年年初以来,一份摘编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间传阅。半月之前,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这份不起眼的农村建设材料上做出批示。

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5位教授呈送的报告摘编而成。5位教授向中央汇报,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,这些问题与农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有关。

这是国家领导人对5位教授上书的第2次批示。2006年11月中旬,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对该报告予以批示,认为报告反映的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、社会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,必须对报告反映的新情况抓紧研究。

一年前,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,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%的人口、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%的国度,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——2006年支持“三农”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,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,达到3917亿元。但是,叶敬忠等5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,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。

“他们集体失语了。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,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。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对记者说。

外部力量主导

在2006年,国家正式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,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,出现了三股

力量: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;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、培训农民等项目;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。

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,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。

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不具体路径选择上,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同步进行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。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——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、贫民窟。

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。比如,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,应该发展“村容整洁”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、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。

在实际运作中,出现了多种模式:传统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农村,以韩国、日本新村建设为模板的新农村,以华西村为模板的新农村甚至新村建设的新农村等。

“新农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,可能有关方面也没想清楚,所以各有各的做法。”6月24日,茅于軾在给记者的一封信中说道。

另类新农村建设

2006年初,国家将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这20字方针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。

2006年5月至6月,叶敬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分别位于中国东部、西部、南部、北部的4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。

他们调查统计发现,在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这一点上,46.8%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,34.3%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,4.7%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,8%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,仅有6.5%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。

事实上,从2006年至今,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——盖房、修路,有些地方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。但“绝大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,缺少实际的举措”。

2006年农业部颁发的《农业部关于实施“九大行动”意见》中,将新农村示范行动列为主要任务的第一条。但是,这种示范行动在实际操作中,却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违——缺乏普及意义。



资料图片

以试点村为例,调研组发现,一个县试图将扶贫村列为试点村,结果,项目报到省里,硬是通不过。

原来很多试点村主要选择经济条件好、有优秀的领导班子和扎实的群众基础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村落。其中,某县的试点村选择的是移民村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作为移民村本来就要投入资金建设房屋,“移民有上级拨款,一并解决了”。这些试点村的财政拨款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元之巨。结果,移民村、文明村、旅游村、生态村便成了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。

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,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:川西一个村庄改造,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万元修一栋房子,房子建好了,又要求别墅化——修车库。不过,他们发现最终猪圈、厕所都没有修。

“用这样的标准,这样的方法来建设试点村,对这些试点村而言,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,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农村社区之间的不平等,而且取得的不经验无法推广。”叶敬忠说。

叶敬忠在甘肃调研发现,很多家庭80%以上收入用于教育,“即使政府出资达到70%、农民出资30%,也建不成新农村”。

体制不顺影响农民收益

最近,“三农”问题专家曹锦清在淮北、甘肃考察期间发现,在西部地区,乡镇一级已经开始无法运转,在新农村建设中,这一级政府无法起到主导作用。而农村中,青壮年男性大量流出,留下老人、妇女、儿童。

调研组在甘肃调研过程中发现,农民对新农村

建设大多表示“知道一点”、“听说过”,甚至没有高达20.8%的农民根本没说听说过新农村建设。

根据调研,虽然有近47%的村民关注的是生产发展,但是,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认为,现在农业的产值越来越低。这已经不同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,当时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。

尽管如此,66.5%的村民认为,缺少资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困难,其次是缺少技术、灌溉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差、劳动力不足、销售困难。对此,中央政府也果断地逐年加大支持“三农”的支出——2003年为2144亿元;2004年为2626亿元;2005年为2975亿元;2006年为3397亿元;2007年为3917亿元。

但是,这样一条递增的曲线中,农民最终受益甚少。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。有学者形容这是“财政支农两千亿,农民受益毛毛雨”。

叶敬忠领导的调研组发现,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条块分割。扶贫系统有扶贫的安排,水利系统有水利的安排,“中间没有太多的监督,没有过程的管理”。

“现在的农业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开始、结果,对实施过程监控很少,很难知道实施中是冲突还是合作。”叶敬忠说,“这不像国际上一些农村发展项目,有一个专门机构在监督、规划、实施”。

即便如此,要让9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,按照目前的行政体制,这种支农资金又不得不按照这种固有的渠道投放。

这种路径依赖,正如中国农业大学5位教授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中所言,导致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,计划中的建设资金受到条块分割的限制,加之地方政府统筹条块资金的能力有限,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。

农民需要组织

叶敬忠告诉记者,此次调研中他从没有这么悲观,又从没有这么欣慰过。“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村民对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。”

2006年11月初,叶敬忠和中国农业大学其他4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呈送了调研报告。10天

后,这份报告就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。

面对组织化程度薄弱的中国农民,这些为“三农”问题奔走呼吁的学者,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——农民——能够有一种组织化渠道以供意见表达。

“政策制定的时候,必须要让农民组织化,通过行业协会等参与进来,不光从经济上,还要从政治上参与决策、影响决策。”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
2007年6月24日,在茅于軾给记者的邮件中,这位78岁的老人一再强调,最重要的是改善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。“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,一般要10年甚至更长。”

新农村建设9大问题及建议

2006年11月初,叶敬忠等五位教授联名向中央上书,表达他们对于目前新农村建设的看法:

1. 新农村建设在部分地区缺少切实举措,导致农民失望、干部彷徨;
2. 农民面临缺少生产性贷款等生产发展方面的困难,再生产投入不足;
3. 乡风文明建设的村级公共设施匮乏,公共活动无从开展;
4. 村庄亮化等工程并非农民最急需开展的村容整洁方面的活动,改造农村卫生条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束之高阁;
5. 村民自治中,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,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方面缺乏公众参与;
6. 新农村建设各地千篇一律,忽视了各地区和各类型农民的多元性需求差异;
7. 目前的试点村做法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;
8. 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和地方政府的夸大宣传,使得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完成时间缺乏客观评价;
9. 留守儿童权益缺乏保障。

9点建议:

1. 重视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失望、干部彷徨的情绪,国家应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制度;
2.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,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;
3. 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自身优势,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;
4. 村容整洁方面应该重点关注农村的垃圾处理、道路硬化、房屋和街道布局与规划等农民急需改造的方面;
5. 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等村民自治制度内容,实现真正的民主治理;
6. 关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农民的需求差异,进行参与式新农村规划建设;
7. 试点村建设应因地制宜地进行,探索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模式;
8. 重视50%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10年内完成的预期,改善宣传方式;
9. 关注留守儿童,从村庄层面保障其权益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

陕西官员举报 8 年扳倒省级高官



庞家钰(资料图)

彻查庞家钰,也是由于我的举报。”魏建军向记者展示着他的几封举报信。

今年5月底,记者在西安、宝鸡采访期间,多次与魏建军交谈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与庞家钰较量最早是在1985年。当时庞家钰任宝鸡市晶体管厂副厂长,有人举报晶体管厂把工业用的黄金倒卖了。魏建军刚大学毕业分到纪委工作,查起案子来非常仔细和认真,结果把庞家钰得罪了。后来的较量是魏建军通过公开招聘当上某局副局长后,庞家钰找了个理由,把他的副局长给免了。使较量进一步升级的是,魏建军多次参加省内、省外副厅级干部公推公选,结果都遭到庞家钰的干预甚至压制。

“8年来,我只做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举报庞家钰!”魏建军昂起头来,运足了气力,用叶剑英元帅七律诗《远望》中的一句诗词来概括他八年来的艰辛举报历程:赤道雕弓能射虎,椰林匕首敢屠龙。

“朋友的提醒,让我判断庞家钰有问题”

魏建军是农民的儿子,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4年,1981年以初中学历参加高考,考入西北政法学院,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魏建军后来的工作也很顺。1995年宝鸡市公推公选副处级领导干部,魏建军考上了副局长的职位。当了3年副局长的魏建军,有一天突然被叫到组织部谈话:免去副局长职务,改任助理调研员。

“因为当时我正准备参加陕西、广西、甘肃等地副厅级干部的公推公选,所以对免职这事就没去深究,心想免就免了,我再考,本来这个副局长也不是谁提拔的,全靠党的好政策和自己的努力。所以,我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应考上了。”魏建军把话锋一转,来气了,“考试没问题,我不怕考。但人家来宝鸡市考察我,市委的意见是我这人‘不能用’,当时庞家钰是市委书记,按照组织原则,提拔副厅级干部需要征求

一把手的意见。”

魏建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“太单纯了”。“一位朋友告诉我,当时如果我送给庞家钰5万元钱,问题可能就化解了,但我不是那种人。况且,我没有错误,是他报复整人,反过来要我向他屈服,这还有天理吗!”

朋友“提醒”魏建军给庞家钰送钱,这让魏建军有了一个判断,“庞家钰有问题”。

老干部透露了许多材料

在一次与庞家钰的激烈争吵之后,魏建军向庞家钰公开摊牌:“你在宝鸡做了那么多坏事,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如果没人告,没人揪,也许你会安然无恙,青云直上。如果有人告,有人揪,也许你就会粉身碎骨。比你年轻15岁,这些人不会和你善罢甘休。”

魏建军很形象地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:“庞家钰大怒,拍着桌子说不怕。我也不示弱,走着瞧。我把门一摔,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”

开始,魏建军心里也没底。因为举报需要真凭实据,而他一个人知道的东西太少了。魏建军首先想到的是市里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。他们见多识广,信息灵通,与高层联系广泛。通过走访,有几名老干部对庞家钰不满,透露了许多一手材料。譬如,庞家钰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读书,他哪来那么多钱?

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,就有很多人向魏建军提供情况,这些人大多是市直机关县处级干部,也都与庞家钰有交锋。

当地干部说,庞家钰打击正派的人,受其“迫害”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30多人,因此是“庞家钰自己培养了掘墓人”。

因为庞家钰在宝鸡可以“一手遮天”,所以魏建军的调查是秘密进行的。“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,我想找个地方打印出来,但打字社的人一看是举报庞家钰的,没人敢接这个活。后来一个打字社要价500元,给打印了3页。”魏建军感觉那段时间自己就像地下工作者,神神秘秘的,连老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锲而不舍举报

2001年8月,魏建军将举报信整理后,通过特快专递寄给国家有关机关和有关领导。在每封信的后面,他都留有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、详细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,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。

“只有这样,领导才可能相信是真的。匿名举报效率低。”魏建军对举报信也颇有研究,“还有一个技巧,举报信不要太长,一般两页半最好,长了,领导没时间看。”

举报信寄出后,魏建军感觉心里不踏实,又专门跑了一趟北京。“见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些老同学,他们都不赞成我举报庞家钰,劝我说,这样的举报信都是用麻袋装,你白费力气,这些人有权有势,报复你易如反掌,因此不如趁精力充沛,挣点钱算了。我告诉这些同学说,举报也许有结果,也许没有结果,但不举报永远没有结果。”

这封举报信引起了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,并作了批示。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,前往宝鸡查案。当时工作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说,“这次调查,让庞家钰侥幸过关。”

2003年1月,庞家钰当上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。“庞家钰履新职前,专门在市委常委会室召见了我们。当时就我们两人,桌上摆放了许多水果,他说话很客气,开始承认免我的副局长有点‘粗糙’。”魏建军回忆说,“庞家钰让我不要再举报他了。”

庞家钰离开宝鸡后,举报他的队伍又扩大了:这次举报,我们选择了7人署名。“还有人想署名,我说,以后再说吧,就婉拒了。”魏建军用手指着这7个人的亲笔签名对记者说,“我们7个人,都是在在职的县处级干部,都很正派。这样,就使举报更具有真实性。”

2005年8月25日,与第一次举报相同,魏建军把举报信快递到了北京。“我不把举报信在社会上到处散布。”

两个月后,彻查庞家钰的序幕于是拉开。

“等庞家钰判刑了我就复婚”

为了不影响家人,魏建军在决定举报庞家钰之初,就与老婆离了婚。“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把财产给了老婆孩子,离婚是不想连累她们。等庞家钰判刑了,我们就复婚。”

记者在宝鸡采访时,当地一些知名人士都让记者捎话给魏建军,要他注意安全。其中一位老干部说,有人要报复魏建军,要他不要一个人走路。

“我倒不关心自己的安危,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保护举报人的具体措施,不让举报人流血又流泪,国家要善待举报人。”魏建军说。(应举报人要求,文中举报人均使用化名)

相关链接:

庞家钰其人

据今年2月5日《陕西日报》报道,中央纪委、监察部严肃查处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,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并报中共中央批准,决定给予庞家钰开除党籍处分。经查,1997年至1999年,庞家钰利用职务之便,收受他人贿赂48万元;违规批准设立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,累计造成损失达3.16亿元;在负责宝鸡市冯家山水库取水工程建设中,严重失职渎职,引水、输水管线先后6次发生爆管,造成经济损失1008余万元;道德败坏,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。

2月2日,陕西省政协九届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撤销庞家钰政协陕西省九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决定》。此前,陕西省政协第二十二次常委会已经撤销了庞家钰政协委员资格。其涉及违法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庞家钰,男,汉族,1988年10月起,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、副市长、市委副秘书长、市长、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,2003年1月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。

据《检察日报》